

“Study on ‘Koushujuden (紅侏儒伝)’ which is a translated novel regarding modern Christianity in China”

Song Lihua

In 1880, a religious novel titled *The Terrible Red Dwarf* was published in the U.K. Only 2 years later, this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an Griffith John (1831–1912), a famous missionarg from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nd it was published by Religions Tract Society in Hankou with the title of ‘Koushujuden (紅侏儒伝)’. Not only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same book had been published twice in ‘Wan guo Gong bao’ which is famous as a magazine that introduced international laws in Europe and U.S. in the end of Qing era. Therefore, by using this translated novel ‘Koushujuden (紅侏儒伝)’ as a material, I will conduct study regarding how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 are used and religious allegorical meanings are given in the novel, and what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 are, in this paper.

‘Koushujuden (紅侏儒伝)’ includes an allegorical story in which a naughty dwarf (a little devil) who commits harmful acts destroys people’s daily life but finally the devil is eliminated by people studying ‘the Bible’ as well as quite a lot of illustrations (iconography) showing people’s daily life in which people are struggling with little devils. These illustrations are used for persons who are not able to read letters. This implies that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in order to enlighten people. Furthermore, many allegorical stories from ‘the Bible’ are cited in this book, which implies that it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Bible’. ‘Koushujuden (紅侏儒伝)’, which had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Hankou located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during the end of Qing era, can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that indicate how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had come down from Europe and U.S. to China.

「中国の近代キリスト教翻訳小説『紅侏儒伝』の研究」

宋 莉華

1880年、イギリスで *The Terrible Red Dwarf* (Mark Guy Perse, 1842

-1930) という表題の宗教小説が刊行された。ところが、この本は刊行後のわずか二年後にはイギリス宣教師 Griff John (1831-1912) の手によって中国語に翻訳され、『紅侏儒伝』という表題で漢口・聖教書局にて出版された。それだけではなく、同書の内容は、清末中国において欧米の国際法を紹介した雑誌として有名な『万国公報』にも二回にわたり掲載されている。そこで、本稿はこの翻訳小説『紅侏儒伝』を素材に、小説にあらわれた隠喩的表現の運用と宗教的寓意は如何なるものであったのか、また、作者の意図と翻訳者の意図は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ったのか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たい。

『紅侏儒伝』は悪事を働くいたずら子（小悪魔）が人々の生活を破壊するが、最後は『聖書』を勉強することで退治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寓話が挿入されている他、挿絵（図像）を用いて、小悪魔と苦闘する人々の生活を描いている場面も少なくない。これらの挿絵の図版の利用は文字が読めない子供を対象にしたものであり、この本の刊行の意図するところが人々の啓蒙にあったことが読み取れる。また、同書には『聖書』のなかに登場する寓話を多く引用していることから、『聖書』から大きな影響を受けていたことがわかる。清末の中国内陸部の漢口で翻訳出版された『紅侏儒伝』は、欧米のキリスト教文学が中国に伝来する過程を示す典型的な作品の一つとして数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近代基督教小说《红侏儒传》研究

宋 莉 华

一、翻译及版本情况

《红侏儒传》(*The Terrible Red Dwarf*) 是英国循道会牧师、作家马皆璧 (Mark Guy Pearse, 1842-1930) 撰写的一部宗教小说, 该书1880年由英国循道会 (Wesleyan Conference Society) 在伦敦出版。不久, 英国传教士杨格非 (Griffith John, 1831-1912) 着手将之译成浅文理的《红侏儒传》, 1882年由汉口圣教书局出版, 同年又在《万国公报》上分两次连载, 题为“大英杨格非著, 金陵



沈子星书”¹⁾。这是一篇隐喻性的小说, 以红侏儒隐喻人的舌头, 说明流言的危害。小说共分四段: 第一段论红侏儒及其所居之洞; 第二段论红侏儒之役使; 第三段论红侏儒在某村所行如何; 第四段论红侏儒在村中如何

1) 第一次是1882年11月25日(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连载于《万国公报》第十五册第716卷, 题“红侏儒传”;第二次是1882年12月2日(光绪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连载于《万国公报》第十五册第717卷, 题“续红侏儒传”。

被制服。书叙红侏儒外形小巧伶俐，长不满数寸，居于奇巧洞中，洞黑而低，以象牙为门，门外又有门闭之。它无恶不作，有时开启洞门出去，焚害众屋，延烧一城，有时使一国被毁，有时群盗自其洞中潜出，劫人宝物，凡此种种，给人们带来了难以医治的痛苦。在某村，红侏儒搅得村民鸡犬不宁，夫妻猜忌、朋友相离、邻里失和，仇敌并起，村民却制服不了它。一日，村中老人在邻村忽得一奇书，书中妙语连珠，老人每日揣摩，智慧大增。村民不时向他学习请教。正巧书中有论红侏儒之事，老人大喜。在老人的指点下，村民们摆脱了红侏儒的迫害，夫妇、亲朋重归和谐。小说最后揭示，老人所得奇书即《圣经》，红侏儒即舌头。

译者杨格非，英国传教士，受基督新教公理宗（Congregationalists）派遣来华。杨格非初译名“杨雅涵”，也译为“杨笃信”、“杨约翰”，1861年后改称“杨格非”。杨格非出生于英国南威尔士的斯温西（Swansea），自幼丧母，父亲是一名道德信徒，在杨格非幼年时便对他进行宗教教育。因而杨格非从小就立意献身上帝，8岁入基督新教公理宗，16岁开始出去领礼拜。1853年加入伦敦会，1855年与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一同来华。初来时，在上海、松江、平湖、苏州、杭州等地活动，并拜见了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获准在太平天国辖境内“随意传道，信教自由”。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西方国家获准在中国内地建立教堂。1861年夏，杨格非偕威尔逊（Robert Wilson）由上海溯江西上，6月21日到达内地重镇汉口，成为第一个进入湖北传教的新教传教士，并在此度过了五十余年的传道生涯。他在汉口（1861）、武昌（1867）、孝感（1880）、黄陂（1898）、天门皂市（1899）等许多地方都设立了传教点，并在这些地方创建仁济医院，因为在他看来“医病能解人的痛苦，感力更大。不久，便开了医院，医院的事功好，名誉也传的宽广。”²⁾ 1863年，他在汉口夹街建起了华中地区第一所教堂——首恩堂，

2) 比顿（Nelson Bitton）：《杨格非传》，梅益盛、周云路译，《国外布道英雄集》第五册，上海：

1864年他又在汉口英国领事的支持下，购得武昌戈甲营的一块土地建造教堂即崇真堂。他在湖北设立了多达百余所的福音堂，并远赴四川、湖南等地传教。1889年，杨格非当选英格兰与威尔士公理会全国协会主席，爱丁堡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99年他又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1905年，杨格非在主日讲道时突然中风，1906年不得不暂往美国纽约儿子家中休养，次年仍回到汉口。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杨格非离开汉口，1912年回到英国，不久病逝。

杨格非是一位高产的作者，而且敢于尝试多种文体的写作，曾经是《万国公报》的重要撰稿人。仅1882~1883年他就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上帝之称》、《引父当道》、《引君当道》、《红侏儒传》、《引民当道》、《日月星真解》、《引家当道》等一系列论著。《万国公报》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传播西学内容最多、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大型中文综合期刊，这也无形中提高了杨格非的影响力。另外他还撰写了《真理撮要》(*Selection of Important Truths*) (汉口：汉口圣教书局，清宣统3年)、《德慧入门》(华北书会，民国元年)、《真道问答》(书名页等处题“真道问答入门”，成都：华西圣教会，民国2年)、《莫包脚歌》(汉口：圣教书局，清光绪间)、《福音大旨》(华北书会，清宣统2年)，翻译了《旧约诗篇》(汉镇英汉书馆，清光绪32年)等。

杨格非有意识地创作和翻译一些宗教故事来吸引读者。如马皆璧(Mark Guy Pearse, 1824-1930)所著宗教小说《红侏儒传》。《红侏儒传》虽然是翻译马皆璧的小说，杨格非在翻译时，却颇多自我发挥。他在书后的跋文中称：“余向在西国见一袖珍小本乃马皆璧先生所著，言红侏儒之事，意婉而深，辞映而正，一再读之，发人猛省不少。壬午桂秋，译以中国文字。其间或芟其冗烦，或润以华藻，推陈出新，翻波助澜，是脱胎于原本，按字谨译也。阅是编者，谓之译可，谓之著可，谓之半译半著，亦

上海广学会1924年，第18页。

无不可。总之，不问是译是著，吾人于一话一言切宜慎之。”

杨格非的合作者沈子星，生平事迹不可考，当为长期客居汉口的下层中国文人、教徒，长期担任杨格非的中文助手。清同治十一年（1872），沈子星还会与汉口伦敦会花楼会堂执事杨鉴堂共同创办过武汉地区最早的以传教为内容的民间报刊《阐道新编》，这份刊物于光绪三年（1876年）停刊。杨格非担任汉口圣教书会第一任会长，该会早年的出版物大多由他口述、由他的中文教师沈子星笔录。“在城里乡下作传道工夫，有几位中国教友常是同伴，有一份帮助，像这样忠心的信徒，愿意受辛苦，受逼迫，对本国弟兄传扬福音真理。这几位和杨氏同事的，总算是道德伟人，或是尽力帮助说教，或用心帮助翻书，所以在汉口有这样效果，也都是协合作成的³⁾。”杨格非尊重中国助手的工作，他是少数几个将助手名字也列入作品的传教士之一。他曾经这样描述传教士与中国助手的合作过程：“当他们（传教士）想要出版的时候，他们就将这个意思口头传达给学者，由学者翻译成流利的、惯用的中文。尽管传教士可能自己不会写，但他应当能够对他的学者⁴⁾的文字形成一种批评意见。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这种能力，这些都是必要的，为了结果能产生比传教士希望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能写出来的更具伟大价值的作品。”这显然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在中国，文学表达的准确和精美历经许多世纪的熏陶培养而成为一种美好的艺术，也一直被推崇备至，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要确定他会避免犯那些被训练有素的眼睛立刻察觉的错误，不触犯一个受过教养的中国人的敏锐的直觉，还不能使该中国人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写的作品退避三舍，这些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⁵⁾。”

3) 《杨格非传》，第33页。

4) 杨格非习惯把中国助手称为“学者”。

5) 韩南：《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0页。

二、隐喻手法的运用

红侏儒在欧洲传说中久已存在，英文称“Red Dwarf”，法文作“Nain Rouge”，据说是起源于法国诺曼底地区的一种神秘生灵。红侏儒形象十分丑陋，个子矮小如孩童，通常穿红色或黑色的皮靴，双眼通红，牙齿腐臭。红侏儒具有攻击性，非常好战，常抓人和家畜作为食物。因此，红侏儒在欧洲文化中被作为恶魔、厄运的象征⁶⁾。不过，很显然，马皆璧的小说《红侏儒传》与这类传说无关，作者是在比喻的意义上使用“红侏儒”这一形象的。小说通篇以红侏儒隐喻人的舌头，来说明流言的危害性。同时书中红侏儒的形象保留了欧洲传说中红侏儒的邪恶色彩，矮小的外形以及好战、惹是生非的特点。



隐喻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语言现象，作为修辞格的隐喻研究历史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他在《诗学》和《修辞学》中对隐喻作过系统的阐述。隐喻是最常见的一种比喻方式，它的本质是用一种事物去理解和经历另一种事物，而把两个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就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行为和文化行为。它首先表现为语言现象，却暗示为更具深意的心理现象，而任何心理现象都是文化现象的深层次展示。文化包括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社会文化中

6)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in_Rouge 及林惠彬《晚清基督教小说〈红侏儒传〉考论》。林文关于红侏儒传说的介绍，大致与维基百科的内容相同。

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语言中来，语言中的隐喻当然与文化息息相关，是语言中民族文化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⁷⁾。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隐喻通常带有宗教性质，作家频繁地运用它，意在深入浅出地揭示神学教义，使深奥的教理得以明白晓畅地显露出来。

《红侏儒传》用邪恶、好战的红侏儒隐喻口舌，直接受到了《圣经》的启示。关于这一点，下文将具体展开。小说通过红侏儒在村子里为非作歹，搅得整个村子鸡犬不宁，人们平静的生活遭到破坏，形象地揭示了它的破坏性。在这个比喻里，每一样事物都是生动具体而强有力的，将读者带入一个熟悉的世界。由于隐喻的运用，说教的色彩淡化了，甚至难以察觉，故事变得有趣而发人深省。杨格非在跋中这样写道：

中国自古以来，传载之事甚多，未知有《红侏儒传》否？惟余自西至东，皆得遇之。在西方，其生平之为人，知之最悉，试略述之于后。华人观此，可知彼红侏儒者，非但在外国有，中国亦有之矣。其性情举动未尝不同，凡侏儒之中，言及乱事害人，无有能比红侏儒者也。异哉！彼之軀干甚小，长不满数寸，总之我未见如此其小之侏儒也。此伶俐侏儒居于奇巧洞中，洞黑而低，象牙为门，门外又有门，闭之甚固。然虽有两重门，实难禁其不出也。无铜工能作锁锁之。大盗锁于监中，猛兽锁于栏内，可也，然此侏儒，门锁皆不能门之锁之也⁸⁾。

不能确定，《红侏儒传》一书是否曾经被作为儿童读物，但是这样奇特的想象，隐喻手法的运用——好象在让读者猜谜一样，读到后面，才恍然大悟，原来红侏儒指的是口舌。这些都足以引起儿童的兴趣。原作者马皆璧还创作过其他儿童文学作品：《孩训喻说》(*Sermons for Children*, 1876)，《康沃尔的传说》(*Cornish Stories*, 1900)，《金子和奉承：西方

7) 李晓红：《隐喻性思维与中西文化认知》，《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214-215页。

8) 《红侏儒传》，汉口：圣教书局1882年，第一页。



故事集》(Gold and Incense: A West Country Story, 1905) 都是写给儿童的，其中也大量运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另外，书中栩栩如生的插图，也会吸引儿童读者。“木工之嗚歌不復聞矣”、“木工之嗚歌復作矣”、“木工之妻忧闷填胸矣”、“农民之犬被红侏儒惊成呆物”、“农民改愁为喜”，这些插图把村民受红侏儒之害以及红侏儒制服之后的生活变化，直观地表现出来。儿童的阅读和接受过程自有其特点，儿童对于图像的喜爱、插图对于辅助儿童理解文本的功用早已经证实。至少在译介者杨格非的预期中，是希望将阅读能力有限的妇孺也纳入其中的。

三、宗教寓意

《红侏儒传》既有汉口圣教书局单行本，又曾在《万国公报》连载。这两个版本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杨格非在单行本的跋后附有一篇《上帝真理》的布道文⁹⁾。

《红侏儒传》中所言之上主，即上帝也。因其论上帝处甚略，恐人轻易读过，不知敬畏而崇拜之也，故特续《上帝真理》一篇于后，使此大道显明。凡人欲改一切邪恶，皆必赖上主之力而始能，非但红侏儒赖上主以制服之也，人人皆当知者上帝真理耳，请细玩此篇而可

9) 林惠彬《晚清基督教小说〈红侏儒传〉考论》对该书版本详加考辨，对于这一点也有所论及，本文曾经参考。

也¹⁰⁾。

对中国儒书中的上帝、佛、菩萨、玉皇上帝一一辨析，来说明基督教的上帝才是唯一值得人敬拜的真神。最后，译者杨格非劝告读者：

一国止一主，设一国有两主，人必不宁，况有两上帝乎！或云：上帝惟一，管理天地人物，必赖百神以佐之，如国君无诸臣辅翊，则国不治。曰：此不明道者之言，以上帝比人，始有此妄论。国君虽为一国之尊，究之人也，才识有限，故必百官匡辅，设国君亦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何用群臣相助为理哉？上帝则不然，全知全能，随处皆在，天上所有之天使，世上所有之人，同为上帝造，才能同为上帝赋，实皆上帝仆。然非上帝所不可少者，蒙帝恩，服帝役而已，故人当认一上帝为主宰也。有求，求一上帝；有得，谢一上帝，见万有之荣光，必恭敬而颂美此一上帝也。中国久忘上帝而不事，因不知万物由上帝而有，赖上帝而存，故妄以天地为神，并天地所有之物为神，如火神、水神、风神、雨神、门神、灶神等是也。又有拜古人求福免祸，信之不疑者，而不知祸福皆上帝主之，与彼何与哉？宜尽弃所有之木石金土雕塑及纸绘之伪像，而恒敬一上帝而已矣。昔上帝垂诫曰：“余而外，不可别有上帝，独一之谓也¹¹⁾。

《红侏儒传》甚至在第四段“论红侏儒在村中如何被治服”中，直接大量引用《圣经》：

木工读《圣经》云：“舌虽小而能夸大，薪甚多，微火可焚之。舌即火，能玷污一身，其罪恶大如世界，能焚毁万物，其火由地狱生。各类之飞禽走兽昆虫水族，皆可制伏，惟舌无人能制，乃最难约束之恶物，害人之毒气充满之”云云¹²⁾。

这段话出自《新约·雅各书》第三章：

10) 《红侏儒传》，第十一 b 页。

11) 《红侏儒传》，第十五页。

12) 《红侏儒传》，第九页。

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书》3：5）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雅各书》3：6）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制伏了。（《雅各书》3：7）

惟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书》3：8）¹³⁾

马太十二章三十四节，又五章十八节可知：耶稣云：“心所存者如何？则口所言者亦如何？”又云：“惟有出口者，乃由心而起¹⁴⁾。”

《新约·马太福音》的和合本原文如下：

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12：34）

惟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马太福音》15：18）

《红侏儒传》中又引《以西结书》：

《圣经》《以西结》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上主告其民曰：“我以新心赐尔，必将尔顽梗之性去之，使尔有柔和易化之心，必将我之神赋尔，使尔遵我之法度而守我之律例也¹⁵⁾。”

这段话出自《旧约·以西结书》：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以西结书》36：26）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

13) 这里《圣经》原文皆出自《圣经》和合本。

14) 《红侏儒传》第九 b 页。

15) 《红侏儒传》第十 a 页。

我的典章。（《以西结书》36：27）

小说《红侏儒传》不仅大量引用《圣经》原文，而且故事情节的设计也受到了《圣经》的直接影响。《圣经》将说坏话的口舌比喻为火和毒，小说中红侏儒让手下拿起火器和毒矢焚毁众屋，延烧一城，有时使一国被毁，有时群盗自其洞中潜出，劫人宝物，凡此种种，给人们带来了难以医治的痛苦。在某村，红侏儒搅得村民鸡犬不宁，夫妻猜忌、朋友相离、邻里失和，仇敌并起，村民却制服不了它。这些都是通过隐喻的手法，以叙事性的故事演绎《圣经》的思想。红侏儒最终被制服，也是得益于人们在老人的带领下学习《圣经》，幡然醒悟。不过，小说在最后附录了一则唐太宗的典故，以进一步印证红侏儒中外皆有，性情举动亦皆同。今录于此：

唐太宗问许敬宗曰：“朕观群臣之中，惟卿最贤，人有议其非者，何也？”

敬宗对曰：“春雨如膏，农民喜其润泽，行者恶其淋漓；秋月如镜，佳人喜其玩赏，盗贼恶其辉光。天地之大，人犹憾焉，而况于人乎？臣无肥羊美酒以调众口是非，且是非不可听，听之不可说。君听臣遭戮，父听子遭扑，夫妇听之离，朋友听之别，亲戚听之疏，乡邻听之绝。人生七尺躯，常凭三存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太宗曰：“卿言甚善，朕当识焉。”

这一则附录既可以视为对小说本身的最好注解，又体现出译者杨格非对中国话本小说体例的某些元素的借鉴，即篇尾用相似或相反的小故事进一步点明主题。

结论

《红侏儒传》虽然只是一部短篇的宗教寓言，带有明显的宗教意图，

但它采用了西方的文学表达方式和修辞手法，想象奇特，给中国读者以新鲜的阅读体验，受到读者的欢迎，可以视为基督教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典范之作。